

印度佛教史

〔日〕多羅那它 著

張建本 譯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貴州大學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印度佛教史

〔日〕多羅那它 著

張建木 譯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貴州大學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印度佛教史 / (日) 多羅那它著 ; 張建木譯. — 貴陽 : 貴州大學出版社, 2015. 5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ISBN 978-7-81126-759-4

I. ①印… II. ①多… ②張… III. ①佛教史—印度
IV. ①B949.35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5) 第 100386 號

印度佛教史

著 者: [日] 多羅那它

譯 者: 張建木

責任編輯: 陳星羽

出版發行: 貴州大學出版社

印 刷: 貴陽海印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張: 8.75

字 數: 160 千

版 次: 2015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81126-759-4

定 價: 60.00 元

版權所有 違權必究

本書若出現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出版社聯繫調換

電話: 0851-85981027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學術委員會

- 方立天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樓宇烈 教授（北京大學）
黃心川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楊曾文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張風雷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宣 方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李四龍 教授（北京大學）
龔 隽 教授（中山大學）
馮煥珍 教授（中山大學）
洪修平 教授（南京大學）
徐文明 教授（北京師範大學）
王雷泉 教授（復旦大學）
陳士強 教授（復旦大學）
麻天祥 教授（武漢大學）
藍吉富 教授（中國臺灣）
林鎮國 教授（中國臺灣）
宋立道 研究員（中佛協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出版前言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屬於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立項的“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第一期工程已經得到貴州省新聞出版局的出版基金資助。這個《文庫》的總編纂指導者是國內著名佛教學專家。參與編纂工作的有老中青三代學人。中青年學者們都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三十多年中成長起來的佛教學才俊。老一輩的學者有中國人民大學的方立天教授、北京大學的樓宇烈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名譽學部委員黃心川教授和楊曾文教授等。承擔《文庫》出版任務的是我們貴州大學出版社。本出版計畫分為三期工程進行，計畫搜羅或再版國際佛教學研究界的最重要作品，所涉及的主要是中國（含臺灣地區）、日本和歐美的佛教學研究界在過去二百年中的標杆性作品。

本《文庫》為開放性的出版項目，其最終出版的規模大小，取決於所涉及作品的版權的解決，更取決於貴州大學出版社的經濟實力，也取決於參與本《文庫》從推薦書目到編纂出版的合作者的努力。本社之所以不自量力，承擔了這麼一個耗資大、耗時長而費力甚艱的文化工程，所企望者，是為國內的佛教學研究界提供一批便於利用的經典之作，為中國的文化建設與文化繁榮盡一個出版者的綿薄之力，當然，也還有巡禮過去二百年來世界佛教學研究中輝煌成果的用意。我們相信，佛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精神財

富之一。佛教學研究是全人類共同的宗教學術探索的精神活動，它也是東西方人文學者的精神創造力的結晶。

佛教原本是東方思想寶庫當中的最重要的一份財富。兩千多年前，佛教在印度誕生。從那裏向四面八方傳播，在南方形成了巴利語佛教；經西北方的中亞向遠東傳播，形成了漢語系的佛教。佛教思想在漢、韓、日的民族文化當中生根發芽，開出了朵朵奇葩；佛教也在“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尋到了自己的家園，孕育出神奇瑰麗的藏語系佛教文化。對於西藏佛教的關注，從二十世紀中期以後，已經成為世界宗教文化研究的熱點。這三大語系的佛教，又稱為南傳佛教、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其中南傳佛教，因為其教理教義上距佛陀本人生活佈道的時期最近，往往被認為深得原始佛教的真義，是初期佛教部派時期的上座長老們的傳統，故也稱上座部佛教。北傳佛教的經典語言是中古以來的漢語，故也稱漢傳佛教。漢語系的經典，從公元之初以降，及至近代，一直使用漢文書寫流傳於世。佛陀的言教，雖然譯自當時的梵語或中亞地方語言，但一經寫為漢文佛典，也在古代的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通行無阻。藏傳佛教的經典形成於十世紀以後，書寫系統和宗教內涵都深受印度思想文化的浸淫。

從空間位置上看，誕生於古代印度的佛教，雖然向四方傳播，但其最顯著的成果則祇在東土和南方顯現。在世界史上的公元之初，佛教並未涉足北方的西伯利亞草原，當時那裏生活的遊牧人群，還無緣沐浴印度的思想光輝；而在同時期的歐洲，因為先已有燦爛的希臘羅馬文明，更有新近誕生的基督教，以及在中近東已經存在上千年的猶太宗教，佛教大約祇能止步於彼。儘管如此，在公元後的最初數百年間，佛教也已進入西方人的視野。在馬其頓希

臘帝國的亞歷山大皇帝眼中，佛教祇是東方斑斕而陸離的諸多宗教文化之一。

以歐洲為代指的西方世界對佛教的真正興趣始於近現代。西方人對佛教的留意，開始於他們在東方的殖民經營。西方學術界對佛教的研究，說來也祇有約二百來年的歷史。歐洲經過了工業革命並形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以後，歐洲文化也挾商業主義和殖民主義之勢向東方侵入。歐洲的宗教、歐洲的思想文化和歐洲的價值觀念，在數百年當中橫掃東方世界，對那裏固有的社會形態和文化形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引起了巨大的變化。西方世界對於亞洲佛教的興趣、關注和研究，正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模式自西而東的大趨勢中產生的文化副產品。

本《文庫》的作品遴選，祇是基於中國佛教文化的立場，出於中國佛學的視角。其所關注的是佛教學研究的基本內容，即佛教的經典與教理、宗派與學派、佛教的制度、佛教的實踐，以及它們同佛教所寄身的社會和依存的文化傳統間的內在聯繫。《文庫》力圖包容含攝的，除了近現代中國優秀學者的著作，更多屬意於歐美的和東瀛日本的佛學著作。本《文庫》的涵蓋時間，僅及過去的二百多年，自然不能代表佛教在二千五百年來的全部的思想創造與文化積累。但因其側重的是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成果，而驅動這一學術探索活動的，是西方啓蒙運動以來的理性主義傳統，科學與理性是西方佛學研究的基本精神，因此，所有的佛學研究成果便具有了與東方世界古來傳統迥然有異的現代精神含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是我們編纂這部《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的本意。

對我們中國而言，佛學研究，古已有之。廣義的佛教學或佛學研究，起步於二千年前佛教傳入中國之時。但從那以後，傳統的佛

學研究是服務於宗教解脫目標的，與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有很大的意義差別。傳統中國的佛學研究，最初的對象雖然自外而來，但活動則是一個文化體系內部的自我研究與自我發現，而近現代西方的佛學研究，則多半是來自外部的學術干預。借用後殖民時代的說法，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視角則完全自外而來的、“他者的”眼光和態度，這種研究隔著雙重的距離——文化的距離感、時代的距離感。從常情上說，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研究者不可能不帶著先有的“成見”或“前理解 (*pre-understanding*)”涉入。按專門研究現代性的社會學家吉登斯的說法，研究者或觀察者在理解時，已經受到“視域”的限制，他們不得制於研究對象的文本和自身的文化身份和立場。吉登斯稱其為“*double context*”（雙重的視域），也就是來自研究對象和研究者自身兩方面的限制，其研究與考察與佛教傳統背景、與學者的知識結構、文化立場與態度都密切相關。

以往傳統當中的佛教學者，無論僧俗，都是佛教的信仰者，其佛學研究的根本目標指向宗教解脫。其學術活動的起點與終點，都祇能是要想達到“解生脫死”，具有強烈的解脫實踐的特點。西方的佛教學研究，以及從事這項工作的學者，其學術研究活動並不必然聯繫於宗教目標，這首先是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所決定的。二百年來的西方佛教學研究，經歷了“宗教學的一民族學的一人類學的”方法論和目的論過程，大致屬於世俗的學術研究。從宏觀方面看，他們借鑒了西方宗教學、社會學、政治學的方法，而在更加技術性的層面，他們在研究當中，也就坦率地採取了比較語言學的、考古學的、文獻學的手段。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佛教學研究領域內出現的詮釋學研究方法，也大量

借鑒了後現代和後殖民研究的立場、觀點與態度。

就此而言，我們的東鄰日本，其佛教學研究，從明治維新以來，也逐步脫離了以宗教解脫為目的的治學實踐，循著世俗主義的學術路子前進。在保留和繼承佛學研究當中的優秀學術風格與手段（文字訓詁、文獻考訂、史論結合）等的同時，日本佛教學研究也吸收社會學的、政治學的，甚至社會文化批評的方法。就日本佛教學術界言，其所產生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纍纍碩果，都產生在十九世紀以降，在日本學者接引了來自西方的，尤其英國和德國的宗教學研究方法之後。

有鑒於以上的原因，我們出版的《現代世界佛學文庫》，致力於搜羅過去二百多年來歐洲與北美的，以及日本的近現代佛教學研究作品。這裏的“近現代”，既有時間上的，也是以理性主義為特質的現代研究方法論意義上的。

佛教學研究是學術性的研究，究其本底而言，與政治目的無關。但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在涉入研究領域時，又不免受到其世界觀與人生觀的價值論立場的影響。因此，學者的發言主張，及其學術結論也不免受到時代政治風氣、學術風氣的影響，在有的情況下，其研究方法也難盡脫政治文化的干預。我們在肯定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西方文化思潮影響下產生的世界佛學研究成果時，另一面也要小心謹慎，言所當言，止所當止。

本《文庫》總結過去二百多年來的佛學成果，大致劃分出以下三個階段的時間框架：

一、十九世紀晚期——二十世紀中期。這一時期，學者們大都致力於用比較語言學的、古文字學的和文獻學的方法來處理佛教的歷史與經典，力求揭示佛教的“本來面目”，力圖展示佛教內在的

“不變的本質”或者“真相”。正是這一時期，形成了三種佛學研究範型：英國—德國學派的，俄國“列寧格勒學派”的，以及法國—比利時學派的。

二、二十世紀中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一時期的佛學研究，可以看法一比學派的學術風格的繼續發展，其他的兩家已經式微。此期的佛教學研究，在原有的語言學、文獻學研究的基礎上，更多引入了社會科學的多種方法，諸如政治學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技術手段被大量植入，而當詮釋學方法引入這一領域後，西方佛學研究更多地呈現了社會關懷和政治批判，不再祇是純學術的“象牙塔”內的學問。

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佛學研究。繼續發揮前兩個階段的優秀學術特點，而隨著西方世界這一時期逐步展開的對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文化精神的反省與批判，隨著普世價值觀和文化多元態度的形成，歐美的和日本的佛教學研究也都開始涉及了帶有“後殖民”與“後現代”色彩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的批判活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東洋”日本的佛教學。它的展開，大致與上述三個時段同步。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佛教學術界，先是借鑒和遵循英德佛學研究的路子，如今則多與北美的佛學研究界聲氣相通。當前日本的佛教學研究，除了配合對日本宗教文化與思維的自省與批判，還有研究的細碎分化傾向，不過這正是社會文化多元發展在佛學研究領域內的反映。

經過兩年的努力，《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第一輯終於問世。我們希望奉獻於文化界和宗教界的這些經典作品，能夠受到社會各界的關心與重視。我們懷著出版人的恭謙與惴惴不安，期待來自社會各界的學術批評和對我們的編纂工作的技術批評。

最後我們非常抱歉地在這裏聲明一句，由於著作權許可的聯繫工作的實際困難，我們這套《文庫》的作品，有的尚未得到原著者或翻譯者的授權。於此，我們懇請諸位大德同我們出版社聯繫，以便我社同權利人辦理相關的授權協議事宜。再次為我們的冒昧致歉，並表達深摯的感恩之情。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貴州大學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十月

本冊說明

藏文本《印度佛教史》一書，是藏傳佛教覺囊派大德多羅那它的傳世名著，成書於1608年，自問世以後一直被推崇為研究印度佛教歷史的權威性著作。全書分44章，約十余萬言，以王朝的更迭為經，以佛教著名大事的傳承為緯，記述自釋迦牟尼去世後，直到印度波羅、斯那兩王朝覆滅時，佛教在印度流傳及盛衰演變情況。1-12章敘述阿闍世王以至迦膩色迦王時舉行第三次結集期間，小乘佛教傳布的情況；13-27章敘述大乘佛教興起，龍樹、提婆、無著、世親、陳那、法稱等顯教大師的活動（以上屬於玄奘、義淨訪印以前時期）；28-37章敘述波羅及斯那兩王朝時期秘密佛教盛行、衰亡的過程；38-44章敘述超戒寺的傳承，南亞次大陸鄰近地區佛法的流傳，小乘的分部，真言乘的起源及佛教造像工藝的流派。

佛教在印度流傳的情況，在玄奘、義淨訪印以前，漢文資料中祇有零星的傳說，法顯、玄奘和義淨的訪印記錄成為這一時期最可靠的佛教史料，至於義淨訪印後佛教在印度流傳的情況，漢文資料失於記載。多羅那它依據摩揭陀的安主賢所作的二千頌，帝授的《佛陀古事記》一千二百頌，使壇著的敘述阿闍黎傳承的一千二百頌，以及他親聞於印度的幾個班智達的傳說，寫成這部著作。其內容不僅可以補充玄奘、義淨以前漢文資料的不足，也可填補以後時期史料的若干空白。波羅、斯那兩王朝時，密教盛行，以超戒寺為

中心，產生許多著名的密教大師；自 10 世紀起，這種密教的經典和修法大量傳入西藏，形成獨具特色的藏傳佛教各派。另外，此書記述王朝盛衰和各王在位年限，也為研究印度古代歷史提供有參考價值的素材，深受學術界的重視。

譯者序言

這個譯本是我 1963 年翻譯的。

翻譯的緣起是中國佛教協會的領導人周叔迦先生交給我兩個譯本讓我加以整理，並說把這兩個譯本合而為一。這兩個譯本，一個是某先生由寺本婉雅的日譯本重譯為漢文的，一個是陳濟博先生由藏文直接譯為漢文的。接受了這個任務之後，我遇到了很大的困難。首先感到，大概是由於那時日本的西藏學不像現在這樣發達，寺本的日譯本有不少的地方與原文相去太遠。其次，兩個譯本如何合法，我個人沒有這樣的經驗。最後，我若就陳譯本加工，又怕周先生以為我有所偏袒，而且陳譯本除了有些地方的譯法我不同意外，用的是文言，而現代的出版物一般都用語體。我既然也懂一些藏文，若把文言的漢譯變成語體，恐怕更加麻煩。由於以上這些原因，我就向周先生說由我直接由藏文翻譯了。陳先生的譯本雖然有不足之處。但遠勝於寺本的日譯本，我在進行這項翻譯工作時，也曾參考陳譯本，這使我的工作得以加快。

陳譯和重譯本在十年動亂中遺失了。當初佛協組織翻譯的史傳，除了《印度佛教史》以外，還有湯住心譯布敦《教法史》、胡繼歐譯童祥《青史》、郭和卿譯五世達賴《西藏王臣記》。可惋惜的是，湯譯、胡譯都已遺失。而我的《印度佛教史》譯本和《西藏王臣記》的譯本却幸存下來。

正在開始翻譯時，中央民族學院約我講授一門有關佛教的課程，其目的是為加強聽課者閱讀藏文古典的能力。當時商定就以此書的藏文原本作課本，從1963年2月起講了一年，全部講完。在講授時把打印出來的漢譯發給聽講者作為參考。

本書的作者多羅那它 (Tāranātha, 1575—1634 年，生卒年都有異說)，原名貢噶寧波 (Kun dgav snying po)，出生於後藏的喀熱瓊尊 (Kha rag khyung btsun)。他在宗教上屬於覺囊派 (jonang)，1608 年他著成此書，1614 年他曾創建達丹彭錯林寺 (rtag brtan phun tshogs gling, 常固圓滿洲)。建寺後不久，漠北蒙古汗王邀請他到蒙古傳法，以後即在庫倫一帶活動了約二十年，被尊稱為哲布尊丹巴 (rje btsun dam pa)。1634 年，多羅那它逝世，次年，蒙古土謝圖汗適得一子，於是以此子為多羅那它的轉世，是為哲布尊丹巴轉世的第一世。一世哲布尊丹巴入藏學經完畢之時，正是黃教的五世達賴鼎盛之時，他被迫改宗，所屬寺院也改奉黃教。

覺囊派在教義上有其獨特的見地，與西藏各宗各派都不相同。這一派主張他空見，所謂“他空見”，就是“認為事物有它的真實體性，這種真實體性不能說它是性空；由於人的‘虛妄分別’增加上去的東西，才能說是性空；因此，所謂性空，只能指由‘虛妄分別’增加上去的東西是空的，而事物本真，自身不能是空的。事物本真是事物之‘自’，加在事物上的‘虛妄分別’是‘他’，因此說性空，只能是‘他空’，不能是‘自空’。”(王森先生著《關於藏傳佛教史的十篇資料》，1965 年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內部印行) 藏傳佛教其他宗派都駁“他空”的論點，如土觀《宗派源流》認為這是“全同外道”。但在《印度佛教史》第七、二十三、二十六、四十一等章中也有“無

我”“無自性”的提法，與大乘佛教的基本論點並無違異。

至於本書在教義方面顯著地與格魯派（黃教）不同的地方是推崇無著超過龍樹。案大乘佛教演變為兩派，一派是龍樹傳下來的中觀派，另一派是無著傳下來的唯識派。格魯派的祖師宗喀巴的著作中，是以中觀派中的應成派為究竟之說。在他的著作中有時說“唯識以下”（Sems tsam man chad），即指除了中觀宗以外所有的佛教宗派，有時說“自續以下”（rang rgyud man chad），即指除了中觀應成派以外所有的佛教宗派。唯識宗判教為三時，大體說來第一時說小乘，第二時說般若，第三時講唯識。而中觀宗有人也講三時，而第二時和第三時的分法恰與唯識宗相反，即唯識是第二時，中觀是第三時。兩宗都以自己所判的第三時教為了義。唯識宗所依據的經典主要是《解深密經》，中觀宗則依據《無盡慧經》。（參看宗喀巴《辨了不了義論》卷三及根敦嘉措《辨了不了義論釋難》卷一）

大乘佛教在印度即已發生兩大宗派，理論錯綜複雜，此處當然無需詳述。我們在這裏需要知道的是本書作者多羅那它對這兩派所持的態度。最明顯的是，在本書第二十四章中他借古代的一個歌謠表明他自己的看法，即“噫嘻龍樹論，有藥亦有毒，慈氏無著論，衆生之甘露”。又在本書第二十五章中說龍樹是初地，而在第二十二章中說無著是三地。龍樹是初地佛教徒，相信是《楞伽經》所“授記”，我國漢僧的撰述，如《大唐西域記》《十二門論宗致義論》也有同樣說法。至於無著是三地，《明句論》有此說法。多氏雖然有其依據，然而聯繫上下文的一些提法，如在第二十二章中謂龍樹時期僧伽多數是聲聞，而在無著時期大乘比丘有好幾萬人，可知仍是推崇無著。此外，在第二十二章中對世親更備至贊頌，其褒辭又

超過無著，在第三十三章中也有因譏毀世親而腫舌的神話。又如《無盡慧經》是以中觀爲了義的，可是在本書中借著世親之口表達對此經的微詞，而以《十地經》爲盡善，可是在宗喀巴的《辨了不了義論》中以爲《十地經》不是了義。又如格魯派以月稱爲應成派中觀師中最可依據的定量，但在本書第二十四章中以爲月稱不如月官，而月官是晚期瑜伽唯識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以上所述的特點，想來多氏也有所本，但可以明顯看出他對兩派中某一派的偏黨。還有在第二十三章的敘述中，他把中觀，唯識間的爭論說成是中觀師挑起的。

本書對於唯識派有其獨特的敘述，如在第十五章中舉出難陀尊者、波羅摩斯那（尚軍）、三藐薩底耶（正諦）三人爲前瑜伽論師，以無著、世親爲後瑜伽師，並謂前者後者無師資之誼。有的學者以爲在無著兄弟以前應當有一批瑜伽師（呂澄著《印度佛學源流略講》第185頁），多氏提供的材料似可參看。

本書對於佛教部派的分裂的記述也有其特點，與漢文和藏文其他的記載都不盡相同，原書俱在，可以參看（如欲從學術上探討此問題，可讀呂澄《印度佛學源流略講》第二講）。對大、小乘的態度，多氏雖然尊崇大乘，在本書中也反映出一些大、小乘的矛盾，但也不過分貶抑小乘，在敘述龍樹、馬鳴、無著時，認爲他們對小乘也不偏廢，這一點與格魯派教義相近。在第十五章中敘述聲聞乘以《十萬般若》爲龍樹所造，在第三十章中敘述聲聞反對大乘，可以作爲小乘主張“大乘非佛所說”的例證。對於所謂“外道”與佛教的鬥爭，在本書中所反映的異常尖銳，尤以第二十六章所述爲甚。但本書有時表現天神是超教派的，如第十三章中大自在天說：“只在佛道中有解脫，其他沒有。”